

B25
3

5



* T 0 1 4 6 3 8 *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梁启超箴言录



“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

总序

尚 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群星煜熠的时代。

它少了先秦鸿蒙的元化和神锋，也不再具有汉唐气象的雄浑和矜贵；它无暇回味魏晋风度的虚灵和清逸，也绝然难以合着宋明道学的从容玄思，一任心神直赴天人之际。它只是带着无尽的屈辱和凝重得令人窒息的民族自我诘问，让一种悲郁的氛围死死攫住近代中国人的心灵。它打掉了一切矫情，俗常人们所必要的虚荣的润饰这时早已脱落得干干净净。民族在一度失了灵魂的重心后，或正把惶惑、怅恨、怨慕和微茫的期许寄托给了值得相托而存主自在的个我的灵魂。这是一个没有“箴言”灵感的时代，但几乎每个以生命进入问题而又以亲切的答问涵养了自己生命的人，都用自己的全幅人生把一份箴谏留给了历史。

这个时代的全部情采都可以赅入“五四”主流知识分子援自尼采的一个命题：“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估”意味

着由道揆而法守、由意义而秩序的民族文化的整全自觉，自觉的契机则在于被一代儒学大师熊十力断言为“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的“中西之辨”。

中国的近代是从对西方的重新发现开始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最初以极不文明的方式启示给东方的则是所谓“富”和“强”的价值。由东西校雠而突显的“富”、“强”的魅力，使一向以“天朝”自视的中国感到技艺上的自愧不如；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想固然多有“制夷”的权度，却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在技艺层次的一种自觉。“洋务”的勃兴是魏源的主张的富于喜剧意味的实现，但“技”在纯粹技艺领域的未可指望，使一批敏锐的中国人把对“技”的倚重引向对“政”的反省。对孔子的微言大义的衍发，作了戊戌变法的前导，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改良政制的纲领并不曾含有多少血和火的消息。无论如何，“戊戌”时期最深邃的思想家严复，即使在温和的变法被扼之以刀剑之后，也还是更看重“开民智”、“新民德”的精神教化作用，但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孙中山就已经由对政治改良的不无期望转而主张激切的、毫不妥协的革命。“辛亥”革命终于使中国有了“民国”和“共和”的名分，但一个几乎无须争辩的事实是，“驱除鞑虏”的民族意识对于革命的刺激显然更大些。与“辛亥”的内在的民族主义性质相谐相盈的莫过于章太炎的“以国粹激励种性”的观念，而章氏晚年倡导尊孔读经也许才真正以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触到了关联着民族精神的“教化”。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继“技”的自觉、“政”的反省后的“教”（教化、价值祈向）的重新认取，陈独秀断言

这文化上的深层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五四”所启示的人生价值主要在于身心的“幸福”，但它对“自由”、“个性”、“主观之内面精神”的提撕，却对于德行“高尚”——人生又一个向度上的恒常价值——所当涵有的“自律”原则的再确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鲁迅所谓“掙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李大钊所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胡适所谓“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这些“摩罗”们的呐喊和剖白，似都可以涵摄于“新青年”主将陈独秀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的意趣非凡的诠释，他说：“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一个造成整个民族心灵动荡的文化思潮不可能无所偏至，“五四”对传统批判的某种偏至引出的是旨在矫治这一偏至的另一种风致的文化思潮。这即是所谓“当代新儒学”。新儒学胎动于20年代初梁漱溟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辨说，但这位“生命化了孔子”的人物毕竟在“并不以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的佛格中。与佛光烛照下“做孔家生活”的梁漱溟构成一种照应，以“亦佛亦儒”的措辞表达所谓“新唯识论”的熊十力为寂寞中复兴的儒学做了“奠其基，造其模”的工作。在“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和当代新儒家的满腹狐疑的对视中，一种必要的张力把关联着民族的时代教化——人生的现实而终极的眷注——的思考引向深入。

循着“技”的自觉、“政”的反省和“教”的重新认取

的线索，“中国近代思想家箴言录”丛书从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的历史中选取了十五位有代表性的思想（或兼政治）人物，分集辑录他们千秋各别的一家之言。他们是：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严复（1853—1921）、孙中山（1866—1925）、章炳麟（1869—1936）、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80—1942）、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4—1968）。所辑句段虽强名之以“箴言”，却并不限于道德训诫或行为劝勉上的格言、警句；那些为编辑对象的生命气象所笼罩的有关宇宙、人生、文化、志业、议政、论学、趣真、审美、情谊、信仰等方面的论断，皆在编录之列。“箴言录”以编辑对象为本位，力求以不失内在逻辑的分类编次使被辑选的言荃得以隐约勾勒出对象的某种生命格局。倘落于言荃，“箴言录”中的箴言或并不能如所期待的那样找出很多；倘不落言荃而直趣心源，每个编辑对象的独异的心灵之光照在哪里，哪里的文字便有可能被点化为堪称箴言的箴言。

就编者的水准看，“箴言录”中的错讹疏漏是可以想见的，但这里诚恳希冀于人们的，除开理所当然的匡正和批评外，也有对这套丛书的宗趣的如是理解：宣示前贤精神中某些具有弥久启示意味的东西，生命化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以规勉、警策那些背负民族希望继续寻路而进的新一代人。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著名学者。

早年追随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1897年赴长沙开办时务学堂并担任总教习。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参与变法。当年9月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先后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介绍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及人文思潮。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建了进步党，并担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对袁氏复辟称帝，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任财政总长。1918年底赴欧洲考察，回国后著《欧游心影录》，宣说西方“科学万能”之梦破产，主张救之以中国故有的文化精神。晚年潜心学术，在学理及治学方法上颇多创获。

梁启超认为“心力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东西”，由此断言“境由心造”，“慧观出真理”。戊戌前后，梁氏是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变法纲领的维护者和论说者，但他更多地把对“群”的理解引向改制层次的“群治”意识，亦即更多地提示一种“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的治制自觉，梁

氏对中西政制以至学术思想作过详尽的校雠，在比勘中强调了“精神”（学术思想）对于“形质”（政事、法律、风俗等）的主导地位，及“自由”意识对于“精神”的命脉意义。

梁氏著述浩繁，大都收入《饮冰室合集》中。

目 录

一、论传统：“积弱溯源”	(1)
1. 平原民族的文化理想	(2)
2. 专制之锢民	(4)
3. 世风颓败，良心麻木	(7)
4. 贪鄙自私以害公	(13)
5. 守旧而恶变	(18)
6. 假名而好伪	(21)
7. “ 奴隶根性 ”	(23)
8. “ 不健全的爱国论 ”	(28)
9. 旧信条、秩序之崩坏	(33)
二、论未来：“新民说”	(36)
1. 国性与民德	(37)
2. 群治与自治	(45)
3. 明责任	(49)
4. 论自由	(52)
5. 释服从	(54)

6 . 说自尊.....	(57)
7 . 伸民权.....	(60)
8 . 广民智.....	(66)
9 . 张权利.....	(69)
10 . 倡独立	(73)
11 . 尚冒险.....	(76)
12 . 正舆论	(78)
三、论人生：“最优美之人生观”.....	(81)
1 . 理想与人生观.....	(82)
2 . 说希望.....	(84)
3 . 说信仰.....	(87)
4 . 自觉.....	(89)
5 . “尽性主义”.....	(91)
6 . 心力与自信.....	(92)
7 . 人格与修身.....	(94)
8 . 论感情.....	(99)
9 . “趣味主义”.....	(101)
10 . “知不可而为”.....	(106)
11 . 论成败.....	(109)
12 . 论毅力.....	(112)
13 . 抗恶俗.....	(115)
14 . 论死.....	(118)
四、论治学：“知行一贯”.....	(120)
1 . “立志”、“养心”.....	(121)
2 “慎思”、“慧观”.....	(124)
3 . “博学”、“笃行”.....	(126)

4 . 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与习惯.....	(128)
5 . 旧学术之反省.....	(130)
五、论文化：“造新文明”.....	(135)
1 . 思想与学术.....	(136)
2 . 文学与艺术.....	(141)
3 . 科学与宗教.....	(145)
4 . 道德与教育.....	(146)
5 . 历史.....	(151)
六、论政治：“救危亡求进步之道”.....	(154)
1 . 政治与治术.....	(155)
2 . 为政与为官.....	(158)
3 . 时势与英雄.....	(163)
4 . 法律.....	(168)
5 . 改革与革命.....	(170)
七、杂论：天下事、世间人.....	(173)

一、论传统：“积弱溯源”

1. 平原民族的文化理想

中国人本是大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他唯尊了。

《评胡适之 中国哲学史大纲 》

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世界无两也。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对自然界，最能为窍妙的顺应，务使本身与环境相妥协。而其妥协，且比较的常为“合理的”。此中国人一种特别天才也。其窍妙之点，则在万事不走极端，而常范以中庸。……我国民不肯为极端的确执故，故个人之道德，最尚者“随遇而安”，政治之格言，最贵者“礼让为国”。……老氏之说，所谓“以柔道取天下”者，实我国民之最擅长也。以此之故，其所最贵者厥惟秩序，务使其所包含之种种异质，与随时变化之环境相应，常处于有伦有脊的状态。急剧之革命事业，我国国民所最不喜且不惯也，故虽有革命，旋必以妥协终了。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我国伦理之系统，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个人（身）为起点，以世界（天下）为极量，而国家则仅与家族侪伍，同认为进化途中之一过程。故其所最乐道者，曰“天下一家”、曰“四海兄弟”。其所以汲汲焉务醇化异族者，非认为权利，乃认为义务。盖我先民常觉我族文化之至优美（此感觉是否正当属于别问题）。而以使人类普被此文化为己任。凡他族之与我遇者，不导之入于此途，则自觉其悲悯之怀不能遂也。彼但能自进而与我伍，我遂欣然相携而无或歧视。故其义曰：“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谓国者绝无界线，惟以文化所被为推移。

《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

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天者有自然法则，以为人事之规范，道德之基本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各国之尊天者，常崇之于万有之外，而中国则常纳之于人事之中。此吾中华所特长也。……凡先哲所经营想像，皆在人群国家之要务，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国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来而在现在。是故人伦亦称天伦，人道亦称天道。……此所以虽近于宗教，而与他国之宗教自殊科也。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吾国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实际。……且其中尤有最重特异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国族制之发达最备，而保守之性质亦最强。故于祭天之外，祀祖为重，所谓天神地祇人鬼。凡称鬼者皆谓先祖也。……尊祖之极，常以之与天并重。……盖常视其祖宗之权力，几与天并，此亦中国人与外国特异之

点也。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报恩之义，各国教祖哲人，莫不称道，至其郑重深切，未有若吾中国者也。凡（筦管）一国人心之枢者，必在其宗教，宗教精神所表示，恒托于其所崇拜之神。……独吾中国一切祀事，皆以报恩之一义贯通乎其间。故曰：夫礼者反本报始不忘其初也。又曰：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凡列于大祀常祀者，皆以其有德于民或能为民捍难者也。……以报恩之一大原则为之主宰，恩我者多，而报不容以不遍，此祀事所由日滋也。既本此原则以立教义，故以此教义衍成礼俗、制成法律，于以构造社会而维持之、发达之。其所以能联属全国人使之若联环相缀而不可解者。

《政策与政治机关》

2. 专制之锢民

大抵专制政体，最足以锢人民之良知良能。我国人政治能力，本非薄弱，徒以久压于专制之下，末由遂其发荣耳。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专制国家之所以得以存在，皆由人民未厌专制政治，常消极默认以为之后援。苟其厌之，一变其消极默认之态度，为积极的反抗，一变其后援之势力而为前敌，则此雷霆万钧之力，

无论如何骄悍险诈之政府，而卒莫能御。

《政府与人民》

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岂有他哉？竞争力销乏使然也。

《新民说·论进步》

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的摧残压抑，其势只有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我以为只有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绝对的恶政治。

《国产之保护及奖励》

吾固言，苟无爱国心者，必不肯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苟其有爱国心者，则当此国家多难而乏才之日，而诸君亦俨然以爱国自命者，乃忍摧萌拉蘖以斫国家之元气也？若以此为国家之蠹贼也而去之，则谁为蠹贼，恐非今日之所能论定也。

《敬告当道者》

亚细亚历史之缺点不在其昔代之行专制，而在今日之犹安于专制，不知何年何代乃脱其樊耳。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一统独立之国，务绥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材异能之徒，故利民

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列国并立者，以有所争竞，故其政府不能不励精图治，以谋国家之进步，求足与他国相角，而不至堕落，如是则国政必修。其国民常与他国相遇，常与战事相习，则其敌忾好胜之心，自不得不生，如是则民气必强。国政修，民气强，而国民之文明幸福，遂随之而日进。此列国并立之效用也。若我中国以数十代一统之故，其执政者枵然自大，冥然罔觉，不复知有世界大局，惟弥缝苟且以偷一日之安，务压制其民，以防乱萌，而国政之败坏萎弱，遂至不可收拾。其国民受压既久，消磨其敌忾之心，荡尽其独立不羁之气，以至养成不痛不痒今日之天下，此则二千年一统之国势所影响也。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

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渐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

《新民说》

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其施政手段，则干涉也，其君臣名分，则强制也，其社会秩序，则等差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则以压制、暴威为大

戒。夫以压制、暴威为大戒，岂非仁人君子之极则耶？而无如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道固未有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我中国数千年来，惟扰乱之时有豪杰，而治平之时则无豪杰，是一奇也。呜呼！吾知其故矣。中国之所谓豪杰者，其任国事也，不过为朝廷之一姓，而非为国民之全体也。故或为一姓创立基业焉，或为一姓拥护私产焉，或为一姓光复旧物焉，数千年豪杰，不出此三途矣。

《中国积弱溯源论》

专制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一人，立宪国之求势利者，则媚于庶人。媚一也，而民益之进不进，于此判焉。

《新民说》

3. 世风颓败，良心麻木

今中国凡百皆不足深患，而惟人心风俗之病征为足患。人心风俗其它之病征尚不足深患，而惟此坐以待之之心理为最足患。人人皆曰国必亡国必亡，则莫复肯为百年十年之计，而惟苟且偷生于一日。既已苟且偷生于一日，则纵肉体之欲惟恐不及，此奢汰贪黷之风所由起也；以名誉更不足顾惜，此寡廉鲜耻之行所由多也；以学问为无所用之，此学绝道丧之象所